



JG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and Spatial Studies

JGSS Vol. 1, No. 1, 2026, pp. 44-54.

Print ISSN: 3105-1294; Online ISSN: 3105-1308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gs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GSS.26.1.05>



选择与省略：“三言二拍”的文学绘图与城市空间重构

张袁月 (ZHANG Yuanyue)

摘要：“三言二拍”是明代话本小说的巅峰之作，但其城市书写常被视为对现实地理的还原，而编者冯梦龙与凌濛初的主观建构作用也长期被忽视。本文基于彼得·图尔奇的五种文学绘图范畴，借鉴罗伯特·塔利的空间性理论、德·塞托的城市空间实践理论等，将“选择与省略”作为核心绘图策略，并将其具体化为地名频率、景观密度、路线轨迹三项空间指标，从而揭示了冯梦龙与凌濛初如何通过取舍重构城市空间。首先，通过调整地名频率移位地图中心，重组了区域空间格局；其次，通过对地标景观的凸显与留白，重塑了城市空间记忆；最后，通过增删节点改变人物路线轨迹，重建了城市内部感知。由此，本研究为文学绘图提供了更细化的制图策略，以及可量化的操作路径。

关键词：选择；省略；三言二拍；文学绘图；城市空间

作者简介：张袁月，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文学地图与文学景观研究，电邮为 zyy@upc.edu.cn。

Title: Selection and Omission: Literary Cartography and Urban Spatial Reconstruction in *San Yan Er Pai*

Abstract: *San Yan Er Pai* represents the pinnacle of vernacular stories (*huaben*) in the Ming dynasty. However, its urban depictions have often been interpreted as faithful reflections of actual geography, while the subjec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pilers, FENG Menglong and LING Mengchu, has long been overlooked. Drawing on Peter Turchi's five categories of literary cartography, Robert T. Tally Jr's spatial theory, and Michel de Certeau's theory of urban spatial practice, this paper positions "selection and omission" as the core cartographic strategy and materializes it into three spatial indicators: toponym frequency, landscape density, and route trajectory, thus revealing how FENG and LING reconstruct urban space through selection and omission. First, by adjusting toponym frequency to relocate the cartographic center, the compilers reorganize the regional spatial pattern. Second, through the highlighting and omission of landmarks, they reshape urban spatial memory. Finally, by adding or removing plot nodes to alter character trajectories, they reconstruct perceptions of internal urban space. In this way, this study provides a more detailed cartographic strategy and quantifiable operational approach for literary cartography.

Keywords: selection; omission; *San Yan Er Pai*; literary cartography; urban space

Received: 02 Mar 2026 / Revised: 05 Apr 2026 / Accepted: 30 Apr 2026 / Published online: 30 May 2026 / Print published: 30 Jun 2026.

Author Biography: ZHANG Yuanyue, Associate Professor at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literary cartography, and literary landscape studies. Email: zyy@upc.edu.cn

话本小说是一种以现代口语或简单文言写作的短篇或中篇故事 (Mair & ZHANG, 2025, p. 554), 通常也称为白话短篇小说 (vernacular short story)。这种诞生于说书场环境的叙事文体, 最初依靠听觉媒介传播, 须通过清晰的地名转换提示帮助听众建立空间感知, 因而在故事中使用大量真实地名、地方景观及准确路线, 绘制出充满细节的城市地图。到明代时, 话本小说完成了从“说话”技艺到书面文学的转换, 并出现了冯梦龙的“三言” (《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与凌濛初的“二拍” (《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这样的典范之作, 但它们仍保留了话本的空间组织形式, 营造出强烈的真实感和现场感。这容易使读者误以为小说叙事空间是对城市空间的客观复原。然而, 即使为同一时期、同一文类的话本小说集, “三言” “二拍” 绘制的城市地图也有差别。这是因为文学地图除了易被察觉的客观性, 还具有主观性。

文学地图的主观性可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地图的主观性, 二是文学的主观性。地图的主观性是指所有地图都会带入制图者的主观立场和价值判断。正如马克·蒙莫尼尔 (Mark Monmonier, 1996) 所强调的, 要想展示“有用且真实”的图像, 精确的地图“必须说些善意的谎言” (p. 1)。文学的主观性体现在所有作品都是经过文学想象和艺术加工的产物, 即使作品地理与真实地理高度相似, 它也并非客观世界的简单复制。彼得·图尔奇 (Peter Turchi, 2004) 论述了作家如何在创作中绘制“想象的地图”, 并总结出五种文学绘图范畴: 选择与省略; 惯例的遵循与背离; 纳入与顺序; 赋形或形式问题; 直觉与意图的平衡 (p. 25)。罗伯特·塔利 (Robert T. Tally Jr.) 在其基础上, 将文学绘图由创意写作技巧拓展为一种文学空间批评及实践。塔利 (2013) 将“文学绘图” (literary cartography) 定义为“创作者或叙事者所进行的类似制图的活动” (p. 46), 强调小说是一种文学绘图形式, 且其绘制不限于现代, 也适用于历史作品 (Tally, 2009, p. 14), 为通常用于后现代小说分析的文学绘图理论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应用提供了依据。值得注意的是, 塔利 (2013) 并未对图尔奇提出的五种范畴等量齐观, 而是重点讨论了“选择与省略”, 其他四个范畴则贯穿其中 (p. 50)。这已触及文学地图绘制的本质——作家并非被动摹仿现实地理, 而是通过主动取舍来建构意义空间。

基于此, 本文将“选择与省略”作为“三言” “二拍” 文学绘图的核心制图策略, 并将其具体为三项空间指标——地名频率、景观密度、路线轨迹, 从而揭示冯梦龙和凌濛初如何通过对地名、景观、路线等地图元素 (张袁月, 2014a, pp. 215-223) 的选择与省略, 绘制文学地图, 重构城市空间。

地名频率: 中心的定位与移位

地名是地图上的必要注记, 承载着空间定位与地理识别的功能。但制图区域显示的地名, 并非对应现实区域的全部地名, 而是经由制图者选择与省略后显示的地理事象。被择取的地名往往指向作家/制图者想要强化或聚焦的空间意涵, 被省略的地名则暗示着空间记忆的遮蔽、回避或边缘化。作者认为重要或熟悉的地名, 在文本中出现频率相对更高, 作者不重视、不关注的地名则倾向于被省略或极少提及。换言之, 作品中地名频次的高低、书写的详略, 反映了文学绘图者对特定区域空间的关注程度、情感倾向与价值取向。作家高频书写的地名定位了他所绘制文学地图的中心区域。即使是历史地图上处于中心区域的城市, 如果书写频率低, 那么它在文学地图上会被移到边缘位置。相反, 历史地图上的边缘地区, 也可能因为高频和细致书写而向中心移位。

文学地图的中心/边缘与历史地图的中心/边缘并不必然重合, 这一现象在塔利的《空间性》

(Spatiality)中已有所论析。塔利(2013)借助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对于“真实的”与“象征性的”(literally and figuratively)边缘区域的揭示,指出“远离伦敦或巴黎大都市中心的偏远地区(distant lands)的种种动向,实际是英国、法国及美国文学与文化形成的核心所在。”(p. 90)由此,塔利将通常并列对立的“中心/边缘”重新关联,提出了“边缘的中心性”(the centrality of the periphery)(p. 90)。这种中心与边缘的可转换性正反映出作家对空间权力关系的主动建构与重构。一方面,作家的绘图行为须受制于文本内部的叙事逻辑与空间逻辑,另一方面,也受到作家自身地理认知、情感经验与时代语境的规约。因此,文学地图更类于一种“热力图”,包含了双重维度。一重维度为平面维度,体现为平面区域里地图元素的空间分布;另一重维度则是立体维度,体现为地图元素的热力强度,即可视化的地名频率。如果只关注平面维度的空间分布,容易把城市区域视为均质化的空间,而统计地名频次所形成的热力强度,则可反映城市空间的异质性与层级性。

与地理制图多将象征权力的政治中心置于地图中心的做法相似,中国古代作家常以都城作为文学地图中心,例如唐代的长安、明代的南京等。因此,在话本小说地图上,北宋(960-1127)都城东京(也称汴京、汴都等,今开封市)与南宋(1127-1279)都城临安(也被称为“行在”,今杭州市)位于中心区域。然而,在话本小说兴起的宋代,由于城市空间格局的变迁,小说的书写重心开始转向市井日常生活空间。这与宋代城市空间格局的变迁密切相关:宋以前的古代城市“基本上是属于以政治为中心的郡县城市”(葛永海,2022,p. 76),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往封闭式的里坊“界标逐渐模糊”,街巷成为“富有活力的城市空间”(葛永海,2022,p. 79)。比较象征政治的皇室空间与承载日常的市井空间就会发现,“御街”这样的政治性空间标识,在宋词中形成了“御街行”这样的词牌名,但在话本小说中复现频率却远低于“茶坊”“酒楼”等市井空间标识。同样,南宋都城临安皇城所在的风凰山区域的地名频率也远低于临安城外的西湖游赏区域。这说明,话本小说地图中心虽然看似仍为两宋都城,但东京与临安在话本小说中的高频书写已不单纯是因为其政治中心地位,而是因为它们也是说书人活跃与市民听众集中的核心文化场域。

具体至“三言”“二拍”,从平面维度来看,两者的文学地图均覆盖了全国大部分区域,并在整体上具有相似的空间分布特征。江南既是冯梦龙与凌濛初生活的熟悉地域,也是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因而地名分布较密集;而地理位置偏僻、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地区,地名较少且分布分散(费团结、陈曦,2017,pp. 28-29)。但从立体维度来看,“三言”“二拍”中的地名热力分布却有所差异。对“三言”“二拍”中所有地名进行提取与频次统计,结果显示,“三言”中有7个地名词频超过了50次,它们都是都城或繁华城市,其中,临安词频列于首位。从地理分布来看,除唐都城长安、北宋都城东京分布在北方,其余5个地名临安、杭州、扬州、苏州、南京皆为江南城市。由此可见,“三言”文学地图的重点区域正是冯梦龙熟悉的江南水乡,而南宋都城临安则位于地图中心。用同样的方法,对“二拍”地名进行统计分析,两宋都城仍属于高频书写区域,但“二拍”中的最高词频地名变为“苏州”。这个差异与我们印象里话本小说以两宋都城为地图中心的判断并不一致。不过,“三言”“二拍”作为先后刊刻的五部话本小说集,其中的时间差与创作变化可以为我们揭示文学地图中心的移位过程。

在刊行最早且保留大量宋元话本旧篇的《喻世明言》中,南宋都城临安的词频高达72次,是所有城市地名中出现频率最高者,词频位居第二的则是北宋都城东京。这反映出孕育于说书场中的早期话本小说创作与传播特点,即,北宋都城东京是最初话本小说的聚焦对象,宋室南渡后,说书人与大量移民一起流落临安,临安也随之成为话本小说的书写中心。随着晚明商品经济的繁荣,小说创作也越来越商品化,苏州、扬州等明代商品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运河城市逐渐成为新的叙事焦点。在《警世通言》中,临安出现的频率明显下降。而到“三言”最后一部小说集《醒世恒言》刊行时,临安虽仍属高频词汇,却不再是最高词频地名,苏州、扬州等地出现频率均高于临安,反映出南宋临安作为

政治中心在话本小说中逐渐淡化的事实。这样的变化在崇祯年间刊印的“二拍”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不仅临安的书写频次锐减，而且苏州、徽州、成都等城市的地名频次皆超过了临安。尤其是苏州，在“三言”中，苏州书写频次仅位列第六，到“二拍”则跃升首位，且地名频次为临安的两倍多。如果用“地理影响文学”的传统观点来推论，苏州应该在苏州作家冯梦龙笔下出现频次最多。为何作为浙江乌程人的凌濛初将苏州置于“二拍”文学地图的中心？

文学绘图理论对于作家主观建构性的重视，为解释这一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冯梦龙与凌濛初在编撰“三言”“二拍”时，体现出明代话本小说的文人性特征：一方面刻意保留说书人口吻并遵循话本小说体制，另一方面融入创作个性与地域经验，使原本代表群体意识的话本小说“开始带有了个性化的烙印”，甚至成为“个人感受的外壳”（刘勇强, 2015, p. 35），这可以对应于图尔奇（Turchi, 2004, p. 25）五种绘图范畴中的“惯例的遵循与背离”。这种带有主体意识的“背离”，使冯梦龙和凌濛初在定位文学地图中心时，可能选择不同的城市坐标。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冯梦龙代表着传统士人意识。他在编纂“三言”时，仍以临安作为核心坐标置于文学地图的中心，正是延续了士人阶层对于正统政权与秩序的象征性维护。一个显著的辅证是，冯梦龙（1958）在将唐传奇《吴保安》改编为话本小说《吴保安弃家赎友》时，情节没有太大改动，却特意添置了“长安”这一地点，并指出吴保安亲赴长安送信需跋涉三千余里（p. 133）。这正是利用了长安作为儒家权力中心的空间象征意义，将儒家所倡导的知情重义品格外化于主人公行为中。相比之下，出身刻书家族的凌濛初更倾向于以市场和读者为中心来绘制文学地图。据“三言”“二拍”的序言可知，冯梦龙和凌濛初都是受书贾之托而编纂话本小说。不同的是，冯梦龙仍强调小说的教化功能，凌濛初则大方承认编纂“二拍”是“三言”畅销后的效仿之举，具有明显的商业动机和明确的市场导向。

这也就不难理解苏州何以能成为“二拍”文学地图的中心。因为晚明苏州不仅是新兴的商品经济城市，更是当时的出版中心，白话小说编创文人群体聚集于此（许振东, 2005, p. 154），读者市场也比较成熟。“三言”“二拍”刊印之际，正是苏州书坊迅猛发展的时期，万历时苏州书坊仅4家，天启时增加到11家，崇祯时则增至17家，而曾作为明代出版中心的建阳，天启、崇祯年间的本地书坊仅各有1家（张袁月, 2014b, p. 35）。凌濛初搜集编创“二拍”故事的主要地点在南京，但出版时却交由苏州尚友堂刊印，这也印证了他对出版市场的重视。如果说“三言”中苏州的高频书写源于冯梦龙的地域意识，那么“二拍”中“苏州”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城市，则更多是凌濛初对苏州经济文化地位的一种回应。与之可为照应的是，明代中后期徽商活跃，也使“徽州”在具有强烈商品意识的“二拍”中，成为仅次于“苏州”的高频地名。

事实上，即使是坚守教化理想的冯梦龙，其城市书写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晚明商业社会现实的影响。《喻世明言》在“三言”中最早成书，也最接近宋元话本传统，但其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已透露出鲜明的时代气息。在小说本事《珠衫》的文学地图上，两位男主角的相遇地被省略，冯梦龙则将相遇地明确标注为苏州枫桥。枫桥在明代是重要的商贸集散地，这样使本处于相隔很远地理空间的蒋陈二人，因其共同的商人身份，合情合理产生了路线的汇合点。不仅如此，枫桥还是明清时期全国最大的米豆集散地，而小说中陈大郎贩卖的货物正是米豆之类。《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更是直接以小手工业劳动者为主角，反映出晚明苏州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历史面貌。这种对苏州场景的细致书写，与临安地名的高频出现看似矛盾，实则反映了文学绘图五个范畴中的“直觉与意图的平衡”（Turchi, 2004, p. 25）。冯梦龙选择宋代都城作为文学地图中心的主观意图是遵循历史叙事传统，维护正统教化秩序，但在苏州生活的直觉经验却使他在书写苏州时，融入真实的细节性。

从整体来看，冯梦龙与凌濛初对于文学地图中心的不同选择，反映了两人对历史记忆与现实关注的不同侧重。这种分异也折射出在晚明商品经济冲击下，城市空间叙事焦点由政治中心向商业中心转移的变化趋势。

景观密度：地标的凸显与留白

景观是文学地图上的一类特别地名，它们不仅是地理区域，也附着于地理实体。景观通常被分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两大类，由其功能属性可细分为政治景观、宗教景观、市井景观等。在绘制城市文学地图时，作家需要在空间区域中填充不同的景观，从而使城市具有可视性和可感性。这实际可归为图尔奇（2004）五个文学绘图范畴中的“赋形”（shape），即作家通过对城市景观的选择与组合，组织文本的结构及形态（p. 25）。因此，文本中某个区域的景观被凸显或是留白，景观密集分布或是稀疏分散并非偶然，而往往是作家绘图意图的具象呈现。

美国制图学家阿瑟·罗宾逊在其主编的《制图学要素》（*Elements of Cartography*）中将制图时对地理要素的处理总结为选取（selection）与概括（generalization）两项关键操作：制图者先选定用于绘制的地理要素和属性，然后通过分类、简化、夸张等手段进行地图概括，确定和突出重要特征，剔除不必要的细节（Robinson et al., 1995, pp. 450-451）。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文学地图的绘制：作家首先要决定在故事或地图中纳入的元素（Tally, 2013, p. 50），然后“必须挑选出某个故事或地点的细节，才能使地图具有意义”（p. 54）。如果说地名频率的高低反映了作家选取哪些地理要素纳入制图区域，那么景观密度的疏密则揭示出作家对区域或地点细节的概括程度。这时，文学绘图者仍以“选择”与“省略”作为核心制图策略。当作家倾向于选择细节，则景观密度趋高；当作家省略细节，景观密度也会相应降低。由此，通过对文学地图上景观密度分布的观察，即可推断作家对某个区域的感知深度和情感强度。

以“三言”“二拍”中的两宋都城为例。“东京”与“临安”皆属于文学地图上的高频地名，但两座城市的景观密度却有显著差异，临安景观的密度相对更高。比如，《喻世明言》第十一卷《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写仁宗“出了朝门之外，径往御街并各处巷陌游行。将及半晌，见座酒楼，好不高峻！乃是有名的樊楼。”（冯梦龙, 1958, p. 180）仅用朝门、御街、樊楼三处景观勾勒皇城外围轮廓，对作为东京地标景观的樊楼描述也比较空泛。而在同一部小说集中，《喻世明言》第二十九卷《月明和尚度柳翠》对妓女柳翠在临安的居住坊巷却描绘得十分详细：“原来南渡时，临安府最盛。只这通和坊这条街，金波桥下，有座花月楼，又东去为熙春楼、南瓦子，又南去为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融和坊，其西为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这几个去处都是瓦子。”（冯梦龙, 1958, p. 464）这段话仅短短几句，却密集出现了12个桥、楼、坊、巷等景观地名，且用方位词标识其空间关系，绘制出柳翠居住区域的文学地图。这段介绍对情节推进并未起实际作用，冯梦龙的主要意图是通过这些密集而精确的景观细节，建构出世俗化、商业化的临安城市形象。而列举瓦子来说明“临安府最盛”，这种叙述逻辑透露出冯梦龙以瓦肆繁华来映照都市气象的绘图策略。迈克·克朗（Mike Crang, 1998）曾提到，“城市不仅仅是行动或故事的背景，对城市景观的描绘同样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的看法”（p. 49）。冯梦龙将皇城周围与瓦肆附近的景观注册在“三言”文学地图上，正是基于他对临安兼具皇权象征与市井气息的城市品格之体认。更重要的是，他要通过这种书写彰显皇家“与民同乐”的气象——而都城繁华和市井活力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里，历来被视为太平盛世、国泰民安的象征。

地标因其具有景观标识的意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具有公共价值的认同，体现出“精神磁场”（梅新林, 2022, p. 42）的功能。对于传统中国作家而言，并非所有建筑地点都适合作为写作主题，只有当地标和纪念碑等建筑能满足人们对逝去过往的怀古之情时，才值得被提及（Wang, 2003, pp. 494-495）。因此，对东京樊楼、金明池，临安西湖等地标的景观密度处理，实际可以反映作家对于历史的感知深度与情感强度差异。例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与《金明池吴清逢爱爱》同出于《警世通言》，均在题目中标识出景观，叙事时空也都在宋代、清明节，情节都涉及人物游玩观景，但前者对临安地标西湖的描写极尽详致，将雷峰塔、苏堤等西湖景观密集列出；后者对同为地标的东京金明池

却书写简略,缺乏具体空间标识。在话本小说名篇《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冯梦龙(1956b)甚至将分别位于城西与城东的金明池与樊楼并置于邻近空间:“如今且说那大宋徽宗朝年东京金明池边,有座酒楼,唤作樊楼。”(p. 274)这种空间逻辑错误在以往通常被视为作者地理知识的疏漏或地理经验的缺乏,但从文学绘图的角度来看,作者实际是在进行地图概括时,压缩了空间从而省略了地标景观之间的其他景观细节,仅保留最具象征意义的核心地标。

即使是对于同一地标景观,不同作家也会由于情感投射与价值取向的差异而调整景观密度。在众多景观中,西湖大概是被话本小说书写频次及密度最高的地标。在话本小说世俗化的文学场域里,西湖已由湖光山色的自然景观,逐渐演化为容纳帝王巡游、文人雅集、市民游乐、商贾贸易的复合空间。各阶层对西湖的共同关注,使西湖在话本小说中的出现频率远远高于其他景观。对“三言”“二拍”景观地名的统计也显示,“西湖”的热力值最高,且与“临安”的共现值也最高。这表明,西湖不仅是临安地标景观,更成为城市意象的核心符号。当西湖景观群在小说里密集出现,即“凸显”时,作者强调湖山胜景,由此映照临安的繁华盛景,进而折射南渡后社会的富庶安定。当这些景观群由密集转为稀疏,即“留白”时,意味着西湖从审美意象泛化为背景空间,也预示着临安由文学地图中心向边缘的移位。

“三言”中的临安地名频率远远高于“二拍”,与之相应的是,冯梦龙绘制的“三言”西湖地图也更加具体清晰,不仅有其他小说写西湖时常列举的白公堤、雷峰塔、断桥等,还有不常见的翠屏山、沈公井等,地名丛集、细节丰富。在《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冯梦龙(1956a)不仅以西湖景致开篇,用传说轶事等串联起金牛寺、飞来峰、冷泉亭、孤山等数个西湖景观,还通过男主人公在西湖区域的行走,将西泠桥、孤山路、四圣观等景观一一绘制在小说地图上,以高密度的景观聚集向读者展现出名胜与市井交织的临安繁华图景(pp. 400-402)。这种“临安繁华梦”的城市意象,与“三言”其他篇目中所展现的临安城市图景是基本一致的。

到凌濛初的“二拍”中,西湖不仅书写频次骤降,而且景观密度也大为降低。西湖周边的景观分布松散,仅有断桥、灵隐寺等寥寥数处。《拍案惊奇》卷十八《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与《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一样,都写到小说人物游赏西湖,但与后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者仅提到一句“来到杭州西湖上游赏”(凌濛初,2012a, p. 237),西湖被处理成一处“留白”的景观区域。不过,凌濛初并非对所有景观都一概简略。同样出自《拍案惊奇》的另一篇小说《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入话用大段描写南京地标燕子矶,介绍其得名由来,还提到燕子矶上的亭子“最是金陵一个胜处”(凌濛初,2012a, p. 325),之后才转到故事发生地弘济寺。正话要讲天竺观音显灵之事,却先以《风》《花》《雪》《月》四词来咏浙江的会骸山——这种铺陈手法曾常见于以西湖为故事场景的小说中。从叙事时空来看,这篇小说入话以徽商为主角,正话提到故事发生在洪武年间,是一个明代故事。可见,“二拍”并非文笔简略,而是对南宋故事的关注度降低,在写明代故事时,其城市地图就会具体细致得多。这说明,凌濛初并非不用细节填充城市地图,只是在他将关注重心由历史临安转向现实江南后,西湖作为临安地标符号的表征也不再凸显。

从西湖景观的复现情况也能发现西湖地位的变化。“三言”西湖景观群中诸如“吴山”“灵隐寺”等复现地名有32个,单是“吴山”便出现127次,而到了“二拍”中,西湖景观群复现地名锐减到了9个,“吴山”仅出现1次。这与临安在“二拍”中频次大幅降低,不再是主要的书写对象,两者趋势是一致的。

塔利(2013)在《空间性》中强调,“当作者选择哪些元素凸显展示,哪些留在背景中,并以最适合的方式来安排元素使其实现作者希望的预期效果,他们同时也在决定这将成为‘何种类型’的叙事或地图。”(p. 54)。同样,当作者选择哪些景观元素凸显、哪些隐去时,他们也在决定这部作品将成为何种类型的城市地图。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城市地图都是不完整的(incomplete)绘制,所有的城市空间也都是选择性的(selective)重构。

路线轨迹：节点的增加与删减

地点之间的空间关系主要由方位和距离确定，这是一种静态的空间分布。但正如塔利（2019）所言，“地图不必被视为纯粹的静态表征，旅程（tour）描述同样在想象的空间中记录了各位置及其空间关系”（p. 4）。这两种不同的空间表征方式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1991）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理论中分别称为“地图”（map）与“行程”（itinerary）（p. 52），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 1988）称之为“看”（seeing）与“走”（going）（p. 119）。事实上，大多数叙事地图都具有“看”和“走”两种视角和叙述方式，前者可大致对应概览性和全局性的“地图”，后者对应路线和旅程（方英, 2024, p. 47）。就中国话本小说而言，其叙事地图既有叙述者（说书人，或模拟说书人口吻的文人）“看”之全局视角，也有小说人物“走”之限制视角。由于最初说书场环境的听觉传播特性，说书人需要给听众创设视觉感，因而话本小说对人物“走”的空间转换尤为重视，常用“出了”“离了”“过”“径到”等动词标记空间移动路径。静态的空间节点分布通常是固定的，体现出空间的秩序性与结构性，而行人“在城市中的行走”（walking in the city）及其交织路径才赋予了空间以形态，并将地方编织到一起（weave places together）。“编织”（weave）这个词语形象地呈现了德·塞托（1988）所称的“他们不是被固定在局部区域（localized），反而是在创造空间性（spatialize）”（p. 97）。德·塞托进一步指出，人们的行走过程可以标注在城市地图上，从而记录下他们的路径，然而，对路线的测绘（survey of routes）却忽略了行走行为本身这一真正重要的东西（p. 97）。

基于此，本文将重点关注地图上地点的动态空间关系——它们由人物行走时的移动路径呈现，并将其细分为两类，一种是路线（route），一种是轨迹（trajectory）。路线是物理空间中可被测量的线性连接，强调从起点到终点的完整路径与方向指引；轨迹是主体在空间中移动的实际路径，包括其停驻、迂回、折返甚至偏航，更强调联结空间的节点及其承载的主体空间经验。当增加空间节点时，人物轨迹随之延展，心理距离大于物理距离；当删减空间节点时，人物轨迹就被压缩，心理距离小于物理距离。这种增删节点以调整轨迹的方式，其核心策略仍是“选择”与“省略”。在德·塞托的《日常生活实践》（*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中，这两种绘图策略被修辞性地表达为“提喻”（synecdoche）与“省略连接词”（asyndeton）。也就是，人物在行走过程中，“选择那些可以代表整体的局部”，比如，“在描述轨迹时用砖房或山丘代指公园”；同时，“会选择和分割所穿越的空间，跳过被忽略的一些连接点和整个部分”（de Certeau, 1988, p. 101）。因此，考察人物轨迹由哪些空间节点联结，以及这些节点如何被选择与增删，能揭示作家对叙事空间的主观建构作用。

以往对话本小说叙事空间的研究通常将小说地理与笔记史料进行互文印证，因而研究者的关注点往往在于人物路线与现实地理的相符程度。例如，话本小说研究的奠基者胡士莹（2011）谈到“三言”名篇《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以下简称《白娘子》）时，将许宣出入临安城所经地名与记录临安城市风貌的笔记《梦粱录》进行比较，指出“其途径确然不紊”（p. 293）。这是一种静态的地理考据方法。如果我们将这个附着在雷峰塔景观上的著名镇妖故事（国内学界一般称为“白蛇”传说，国际上称其为“Madam White”或者“White Snake”）置于话本小说的动态重述中，或者说，不同作家的地图重绘中，就可以发现在不同话本小说版本中，男主角的行走路线差异不大，但轨迹却因节点的增删而有所变化。

作为地理实体的雷峰塔，早在公元10世纪就已建成，却很少出现在造访西湖的文人作品中。宋代高僧契嵩在登临西湖南屏山时，详细记录了行程路线，却“对雷峰塔只字不提”（Wang, 2003, p. 494）。同样，在作为《白娘子》镇妖故事雏形的宋话本《西湖三塔记》中，作者详细记录了男主人

公在西湖的行走轨迹，却仍然没有纳入雷峰塔这一空间节点。直到冯梦龙编纂《白娘子》时，雷峰塔才成为故事中的重要景观，也使雷峰塔在西湖景观群里的显示度明显提升。不仅如此，冯梦龙还利用他对空间节点的增加与连缀，使临安城内外的空间细节性也更加丰富。在《西湖三塔记》中，男主人公从家里到西湖边的行走轨迹仅由“径出钱塘门”—“过昭庆寺”—“往水磨头来”—“行过断桥四圣观前”（洪楸，2004, p. 8）几处节点联结，甚至省略了断桥与四圣观之间的数处景观，将空间轨迹压缩为跳跃式的线条符号。而到了《白娘子》中，男主人公的轨迹则被显著延展：“离了铺中，入寿安坊，花市街，过井亭桥，往清河街后钱塘门，行石函桥过放生碑，径到保叔塔寺……离寺迤迤闲走，过西宁桥、孤山路、四圣观，来看林和靖坟，到六一泉闲走……走出四圣观来寻船……离了岸，摇近丰乐楼来。”（冯梦龙，1956a, pp. 421-422）在出钱塘门之前，将临安府城内的街巷节点纳入轨迹，增加了生活气息与市井质感；在游玩西湖后，又将路径的终点延伸指向丰乐楼这一临安地标性酒楼，强化了小说城市空间的世俗性；而在西湖区域，除了保留西宁桥、四圣观等传统节点以外，还特意选取了孤山、林和靖坟、六一泉等文化地标，注入了文人意趣，从而绘制出雅俗交融的临安地图。事实上，这种文人性的绘图策略，在《白娘子》开篇用“看”的视角铺陈介绍杭州西湖的景观群时，就已经在有意操作了。《白娘子》看似与《西湖三塔记》一样，均罗列苏堤、林和靖坟等西湖胜迹，但后者是通过说书人视角，用韵文套语的方式列出，前者则将与景观相关的文化名人如白居易、苏轼、林和靖（林逋）等，以传说事迹的方式嵌入西湖介绍中，反映出身在文人阶层的冯梦龙主体意识的投射。

在《白娘子》之后，有多部话本小说与戏曲作品重述了这个雷峰塔镇白蛇的故事。例如，清代古吴墨浪子（1981）的《西湖佳话》记录了西湖十六个标志性景观的传说故事，其中，《雷峰怪迹》在主体情节上和《白娘子》基本一致，男主人公许宣的行走路线也基本沿用《白娘子》的设定，却将后者近40个空间节点删减至21个（pp. 266-286）。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清代话本小说家对南宋时临安的空间布局已不如明人熟悉。但如果注意到冯梦龙有意选取的寿安坊等市井街巷、林和靖坟等文化地标，在《西湖佳话》中几乎都被省略，那么这种删减便不再仅仅是地理认知的局限，更是一种文化意图的弱化。另一方面，古吴墨浪子（1981）在“白马庙戴先生捉蛇”一段情节后，增加了“清波门”这一空间节点（p. 282），叙写许宣因害怕白娘子直接一路跑出清波门外，反映了白娘子妖法厉害，且反衬出后文中法海镇妖的佛法高强。这一删一增，强化了雷峰塔的宗教属性。此外，雷峰塔本是《白娘子》故事结尾的镇妖环节才出现的景观，古吴墨浪子却将其置于开篇位置，通过“纳入与排序”绘图策略，使雷峰塔在西湖文学地图上的地标表征得以凸显。这与古吴墨浪子在《西湖佳话》整部小说集以景观为中心的编纂逻辑一脉相承。

实际上，在绘制人物轨迹时，作家常常会在进行“选择与省略”的基础上，使用“纳入与排序”的绘图策略。有时作家绘制的轨迹出现绕路、偏航甚至不合空间逻辑的现象，这在以现实地理为文本空间参照的传统研究中，往往被视为地理舛误。但以文学绘图的视角观之，作家不一定是对城市陌生或记忆有误，也可能是在运用“纳入与排序”策略改变节点次序以重构空间关系。例如，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六《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本事来源于瞿佑《剪灯新话》卷三《翠翠传》。本事中男主人公金定寻找妻子翠翠的路线为“平江—绍兴—安丰—湖州”（瞿佑等，1957, p. 79）。从空间关系来看，苏州平江与湖州都在太湖区域，但人物轨迹却绕行绍兴，再远至安徽安丰，最后折回湖州。这种迂回的路径正衬托了金定寻人的曲折过程。到“二拍”中，凌濛初（2012b）保留了平江至湖州的迂回路线设置，整体的方向和行程基本与本事一致，却增加了缀联两地的空间节点：“扬州—长江—润州—平江—临安—钱塘江—绍兴—安丰—湖州”（p. 96）。添置的这几处联结点看似对情节并无实质性推动作用，实则包含了凌濛初的深层空间意图：在“平江”之前，增加“扬州”“润州”等江南重镇，在“平江”之后插入南宋都城所在地“临安”，并且明确标注“长江”“钱塘江”，将人物活动轨迹限定为水路，原本模糊的江南叙事时空因而体现出更加鲜明的地域特征；同时，也使寻

妻路线更为辗转,进一步凸显出金定寻妻的艰辛以及对妻子矢志不渝的真挚情感。更重要的是,原本与临安无涉的故事也因纳入“临安”这一联结节点,从宽泛的江南地域叙事转变为带有南宋都城记忆的特定历史语境。临安是在宋金战争中建立的临时都城,《李将军》中金定与妻子也是因战乱离散的平民夫妇,使读者从这个元代故事中自然联想到宋代百姓的流离之痛,从而将个人命运悲欢升华为时代创伤的集体记忆。

比较《李将军》与《白娘子》的临安城市地图,会发现凌濛初更多是将“临安”概括为一种象征符号,对城市内部的细节远远不如冯梦龙所绘制的丰富。这与“二拍”在临安地名频率、景观密度趋低的整体特征相契合。由此也再次证明,作家并非被动反映城市空间的摹写者,而是主动参与城市空间生产的建构者。

结语

文学绘图理论使地图不仅成为一种呈现文学的方式,还能够“以一种‘空间的’思维和方式重新诠释文学”(方英,2020, p. 42)。塔利(2013)曾提到,“由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文学绘图本身就是一种为世界赋形的手段”(p. 50)。我们同样可以说,小说的文学绘图也是为城市赋形的手段。与制图者以面状、点状与线状要素的概括来表征现实空间类似,作家也通过由地名圈定的区域(面状要素)、地名与景观(点状要素)、路线轨迹(线状要素)来重构城市空间:以地名频率的高低复现为区域定位中心,以地标景观的疏密聚合为城市恢复肌理,以路线轨迹的长短交织勾勒可感知的城市轮廓。在作家对这些地图要素的选择与省略中,城市被赋予了不同的形态。尤其是像“三言”“二拍”这样由文人作家编纂的话本小说集,即使是对话本旧篇的整理修订,也不可避免地会加入作者个体的空间认知与城市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中的城市空间不仅是由小说人物的视线与路线所建构的,也是被每一个重述者用文学绘图策略所重构的。

“三言”“二拍”的文学绘图策略与实践,不仅为空间文学研究提供了来自中国叙事传统的典型案例,也使文学绘图理论在非西方、前现代文本中获得跨文化语境的适用性验证,对中国话本小说、城市文学及文学地理学等研究领域同样具有矫正与拓新的意义。在偏重时间维度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传统中,地名真实、路线准确的话本小说通常被视为一种史料,用于“文史互证”;20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兴起推动了文学研究中空间维度的强化,但又往往陷入“文地互证”或“地理决定论”的误区。若能跳出“真实一失真”的文学地图评价框架,对文学绘图中作家的主动空间选择给予充分关注与积极阐释,则可能开辟一条将中国特色与全球视野融合的新路径。随着数字地图平台的建设与AI、GIS技术的发展,地名频率、景观密度、路线轨迹等空间要素均能够快捷转化为可视化的大数据,抽象的城市空间可得以具象呈现。文学绘图在技术赋能下也将更深入展现作家对空间的建构与重构。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地理学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3&ZD27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ZHANG Yuanyue ^{1D} <https://orcid.org/0009-0002-0266-3425>

References

- Crang, Mike (1998). *Cultural geography*. Routledge.
- de Certeau, Michel (1988).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Steven Rendall, Tra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方英 (2020): “文学绘图: 文学空间研究与叙事学的重叠地带”, 《外国文学研究》42 (02): 39-51。
- [FANG, Ying (2020). Literary cartography: An overlapping territory of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and narratology.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2(2), 39-51. <https://doi.org/10.19915/j.cnki.fl.s.2020.02.004>]
- 方英 (2024): 《文学空间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FANG, Ying (2024). *Spatial literary criticism*.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费团结、陈曦 (2017): “论‘三言’中的文学地理分布”, 《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8(06): 28-32+43。
- [FEI, Tuanjie, & CHEN Xi (2017). On the distribution of literary places in *San Yan*. *Journal of Taiy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8(6), 28-32+43. <https://doi.org/10.13710/j.cnki.cn14-1294/g.20171026.001>]
- (明)冯梦龙编 (1956a): 《警世通言》, 严敦易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 [FENG, Menglong (Ed.). (Ming). (1956a). *Stories to caution the world (Jingshi tongyan)* (Collated and annotated by YAN Dunyi).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明)冯梦龙编 (1956b): 《醒世恒言》, 顾学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 [FENG, Menglong (Ed.). (Ming). (1956b). *Stories to awaken the world (Xingshi hengyan)* (Collated and annotated by GU Xueji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明)冯梦龙编 (1958): 《喻世明言》, 许政杨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 [FENG, Menglong (Ed.). (Ming). (1958). *Stories to enlighten the world (Yushi mingyan)* (Collated and annotated by XU Zhengya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葛永海 (2022): 《中国城市叙事的古典传统及其现代变革研究》。商务印书馆。
- [GE, Yonghai (2022). *A study o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urban narrative*. The Commercial Press.]
- (清)古吴墨浪子 (1981): 《西湖佳话》, 邵大成校注。浙江人民出版社。
- [Guwumolangzi (Qing). (1981). *The beautiful tales of West Lake (Xihu jiahua)* (Collated and annotated by SHAO Dacheng).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明)洪梗 (2004): “西湖三塔记”。王国平主编: 《西湖文献集成》(第28册), 杭州出版社: 1-14。
- [HONG, Pian (Ming). (2004). Story of the three pagodas in West Lake (*Xihu santa ji*). In WANG Guoping (Ed.), *Compilation of West Lake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28; pp. 1-14). Hangzhou Publishing Group.]
- 胡士莹 (2011): 《话本小说概论》(上、下卷)。商务印书馆。
- [HU, Shiyong (2011). *Introduction to vernacular novels* (Vols. 1-2). The Commercial Press.]
- Jameson, Fredric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明)凌濛初 (2012a): 《拍案惊奇》, 冷时峻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 [LING, Mengchu (Ming). (2012a). *Amazing tales (Paian jingqi)* (Punctuated and collated by LENG Shijun).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 (明) 凌濛初 (2012b): 《二刻拍案惊奇》, 王根林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 [LING, Mengchu (Ming). (2012b). *Amazing tales: second series (Erke paian jingqi)* (Punctuated and collated by WANG Genlin).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 刘勇强 (2015): 《话本小说叙论: 文本诠释与历史构建》。北京大学出版社。
- [LIU, Yongqiang (2015). *Assessing huaben stories: Tex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Mair, Victor H., & ZHANG Zhenjun (Eds.). (2025).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 梅新林 (2022): “古代小说研究的‘空间转向’与范式重构”, 《文学遗产》(04): 38-52。
- [MEI, Xinlin (2022). “Spatial diversion” and paradigm re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on ancient Xiaoshuo. *Literary Heritage*, (4), 38-52.]
- Monmonier, Mark (1996). *How to lie with maps* (2nd e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明) 瞿佑、李昌祺、邵景詹 (1957): 《剪灯新话(外二种)》, 周夷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
- [QU, You, LI Changqi, & SHAO Jingzhan (Ming). (1957). *New stories told while trimming the wick (Jiandeng xinhua)* (Collated and annotated by ZHOU Yi). Classic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Robinson, Arthur H., Joel L. Morrison, Phillip C. Muehrcke, A. Jon Kimerling, & Stephen C. Guptill (1995). *Elements of cartography*. John Wiley & Sons.
- Tally, Robert T., Jr. (2009). *Melville, mapping and globalization: Literary cartography in the American Baroque writer*.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 Tally, Robert T., Jr. (2013). *Spatiality*. Routledge.
- Tally, Robert T., Jr. (2019). *Topophobia: Place, narrative, and the spatial imagin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Turchi, Peter (2004). *Maps of the imagination: The writer as cartographer*. Trinity University Press.
- Wang, Eugene Y. (2003). Tope and topos: The Leifeng Pagoda and the discourse of the demonic. In Judith T. Zeitlin, Lydia H. Liu, & Ellen Widmer (Eds.),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Essays in honor of Patrick Hanan* (pp. 488-552).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许振东 (2005): 《17世纪白话小说的创作与传播: 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XU, Zhendong (2005). *The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vernacular novels in the 17th century: A study centered on Suzhou region*.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张袁月 (2014a): “近代小说中的文学‘地图’与城市文化”, 《文学评论》(03): 215-223。
- [ZHANG, Yuanyue (2014a). Literature maps in early modern novels and urban culture. *Literary Review*, (3), 215-223.]
- 张袁月 (2014b): 《晚清吴地小说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
- [ZHANG, Yuanyue (2014b). *Study of novels related with Wu area in late Qing dynasty*.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校对编辑: 徐王玟 张平)